

## 前 言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迈过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正满怀希望迎接新世纪来临，期盼着祖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但是，我们要想将美好的憧憬变成现实，还应居安思危，具有民族忧患意识，认真正视国家安全面临的潜在威胁。有人也许会觉得，国家安全乃是领导人关心的大事，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其实不然，它不仅同中国命运和国家安危，还同每一个普通人的切身利益，都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

美国野蛮轰炸南斯拉夫和中国大使馆，无疑给人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人们在表示震惊和愤怒之后，心中不由也产生了种种困惑，感觉到有必要重新认识世界格局，以及中国作为大国所处的位置。隐约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潮流”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危险趋势。为何冷战之后世界仍然不太平？为何千禧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前夕，却在喜庆时刻出现了不吉祥的凶兆？为何美国给世界送来充满血腥气的贺礼？北约宣布新干涉主义战略居心究竟何在？为何李登辉发出分裂国家的狂妄言论？

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实施的狂轰滥炸，人们感到了现代高科技战争的威胁，意识到中国应尽快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拥

有更先进的飞机、军舰和巡航导弹，保卫祖国统一和领空、领土不受侵犯，保卫和平的经济建设和幸福安定生活。军事战争题材一时成为热门畅销书籍，《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超限战》纷纷面世，走俏国内市场，人们竞相购买、阅读。随着台湾海峡骤然出现紧张局势，人们开始关心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美国将会采取何种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中国能否成功抗衡美国威胁，维护国家统一。

但是，中国面临的威胁难道仅仅来自战争吗？难道仅靠更多的高科技武器就能保卫国家吗？中国人在警惕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的同时，还没有意识到有一种隐蔽的“软战争”甚至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此时此刻正威胁着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这样说绝不是为了危言耸听，事实上，这种“软战争”比较军事进攻的“硬战争”对中国来说构成了更为现实的威胁。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对于贫穷软弱的旧中国，可以凭借着“坚船利炮”进行军事侵略，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和洲际导弹，拥有强大武装力量抗衡直接军事威胁，美国不会轻易冒同中国爆发战争的危险。

越南战争惨败后，美国被迫放弃了“冷战战略”，转而实行“缓和”战略的时期，其研究国际战略的智囊纷纷提出，运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手腕，继续遏制并且伺机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扭转不利于美国的世界实力均衡变化，作为重新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政策武器。这些主张绝不是文人墨客的夸夸其谈，而是亨廷顿之类国际战略大师的杰作，后来果然化成了厉害的“软战争”利器，变成了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铜暗器”。倘若说核武器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种“软战争”威力足以摧毁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金融命脉陷入瘫痪状态，廉价落入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中。80年代，拉丁美洲经济陷入“外债陷阱”，90年代，俄罗斯经济惨遭“休克疗法”破坏，金融风

暴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 充分显示了这种“软战争”的巨大威力。

南斯拉夫有铁托时代的武装抵抗传统，又有拥有核武库的俄罗斯背后撑腰 为何美国不怕重蹈越战失败的覆辙 也不惧俄罗斯拥有核武库的威胁，敢于粗暴军事干涉南斯拉夫呢？其实 美国是先以隐蔽的“软战争”开路 削弱了俄罗斯的强大军事工业实力 控制住了其国民经济命脉和政府高官 迫使南斯拉夫陷入经济危机动荡状况，长期暗中扶植科索沃的武装分裂势力 然后待时机成熟后才发动“硬战争”重新运用越南战场上的野蛮狂轰滥炸，悍然提出北约的新干涉主义国际战略 赤裸裸地公然谋求建立世界霸权秩序。

一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人曾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辱 对于西方列强发动“硬战争”记忆犹新 但是 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熟悉也不愿相信 美国会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软战争”其破坏威力甚至超过令人恐怖的核弹。近 20 年来 西方主动改善对华关系表示友好姿态 善良的中国人早已不念昔日旧恶 相信曾捕杀自己的豺狼改邪归正。因此，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使馆事件 颇为出乎善良中国人的意料 内心中难免产生种种困惑和不解。作为普通中国人中的一员，我非常理解善良同胞们的心情 自己也曾有与多数人相同的想法 只是经过漫长的留学和研究生涯，才逐渐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潜在威胁。

80 年代初，我曾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学，那时很羡慕西方的市场经济好处，但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却令人惊讶，主张通过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 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实力均衡”明确提出运用任何战略手段或筹码 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领域，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秩序。当时西方流行的

国际“缓和”理论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主张应利用经济利益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资金、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

当时我出于善良中国人的天性认为追求和谐发展乃是天经地义，曾积极为“理想主义”的合理性辩护，倘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相信“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但是，美国教授却说“理想主义”并非不好，只是从历史上看统治者从来不把它当回事。于是，我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反感，情愿陶醉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那里可以找到“理想主义的共鸣”。后来，我又赴美国长期留学，专门研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有意躲开讨厌的国际政治理论。我除了进修宏、微观经济学理论之外，还选择了一些专业经济学课程，如比较经济制度学、发展经济学，更多接触到前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状况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和福利状况。

80年代，随着美、英右翼保守政府纷纷上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一时，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华盛顿共识”，强迫拉丁美洲推行自由化改革。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我接触的许多美国经济学教授，他们非常关心发展中国家经济，却批评国际机构推荐的“规范改革”，促使我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作用。发展经济学乃是“冷战时期”，西方为了同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才资助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政府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作用，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与贫富悬殊，跨国公司投资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等等。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排斥发展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令我对它产生了很大怀疑。

留学归国后，我研究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国际权威组织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

采取了不盲从和适当批评的态度。但是，我只是认为这些改革药方不符合国情，从未批评这些药方是“蓄意误导”。我曾撰写关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文章，虽然批评美国推荐的激进“休克疗法”，却从未指责过美国搞阴谋蓄意进行破坏，也未将其同美国的国际战略联系起来。直到后来接触到美国出版的《胜利》一书，才迫使我从骤然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开始将以前早就感到可疑的种种情形，提高到国际政治战略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1996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走上自杀性改革道路。他还在书中透露：“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等等。以前我从不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式，特别是采用沙塔林制订的“五百天计划”，也知道索罗斯积极资助参与了拟定计划过程，甚至还知道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特殊关系，80年代曾因此而被中国政府拒之门外，但是却从来没有将这些种种可疑迹象，同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仿佛怀疑别人就是自己的罪过。

尤其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彼得·施瓦茨还居然在该书序言

中露骨地说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不幸遭到阴谋陷害，却仍然不愿怀疑凶手的善良受害者。现在面对着彼得·施瓦茨的无情嘲讽，我开始对潜在威胁感到不寒而栗，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习惯思维方式，担心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中国身上。

施瓦茨不愧是经验丰富的情报老手，一眼就看出了善良人容易犯的错误。面对这样训练有素老师的坦率指点，的确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粗心大意，明知别人被害却不担心谋杀威胁，也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经过彼得·施瓦茨的指点迷津，我不再将自己局限于纯粹经济研究，而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问题，借鉴各种学科甚至侦探破案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观察每个微细环节，不轻易放过不合逻辑的可疑之处。有趣的是，以前学术研究感到困惑的问题，许多始终感到难以解释的现象，从新视角思考反而变得清晰明了。

以前我常常暗自纳闷，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从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上说漏洞百出，还遭到如此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反对，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明知效果不佳，很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灾难性后果，为何国际权威机构却仿佛视而不见，偏要固执地强迫俄罗斯、拉美推行呢？难道果真如此痴迷于“自由市场神话”吗？现在拜读了彼得·施瓦茨的大作，回想起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如追求国家自私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以新政策武器支配世界的“缓和理论”，深入考察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令人困惑不解的谜团也就昭然若揭。

其实，不需要妄加任何的猜测和推断，西方战略家已清楚

吐露了战略动机 公开宣称将中国视为重大战略威胁 甚至公布了自己搞阴谋破坏别国的前科 倘若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蒙起眼睛一心作“善良的羔羊”还担心怀疑别人就会冤枉好人 那么迟早必将成为“豺狼喜爱的美餐”。彼得·施瓦茨洋洋得意地吹嘘 他曾作为美国雇佣的大批专家之一 参加了策划瓦解别国的秘密战略。难道中国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学者们 却不耻于分析西方策划地缘战略阴谋 陶醉于作书斋学问传播西方规范理论，而不顾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面临威胁吗？

我深深知道 许多善良的中国人阅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感到不理解 and 观点偏激 担心如此怀疑别人会冤枉西方国家 担心怀疑西方推荐药方会影响改革开放。由于轻信了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误导 许多中国人将俄罗斯和东南亚的不幸遭遇，统统归罪于这些国家自身管理不善。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中国报刊上常常有为美国辩护的论调 如“金融危机是裙带资本主义造成的”、“索罗斯只是为赚钱何罪有之”？“苍蝇不叮有孔的蛋吗”？“毛病出在鸡蛋自身有孔 爱闻腥的苍蝇何罪有之”？但是 按照“鸡蛋有罪论”的逻辑推演下去 岂不是谋杀应该责怪被害人粗心大意，而谋财害命的狡猾凶手反而无罪了吗？

令人敬佩的是 许多美国著名学者却看出了问题 还敢于站出来为亚洲国家辩护 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的药方加重危机。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 尖锐地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所谓援助计划“同金融危机相比，‘挽救 韩国、泰国和印尼的行动 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 历时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 1994 年和 1995 年那样 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更为明确指出，70 年代

以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方面，已被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确指责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时代”，还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地说，“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斯蒂格利茨身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却如此尖锐批评“华盛顿共识”，是因为这套所谓规范药方危害如此之大，实在难以再用种种借口来遮掩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准确预言过东南亚将会爆发经济危机，指出“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他还指出，由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曾被迫承认政策失误，但是，1998年巴西爆发危机之后，经济下降，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已被通货紧缩替代，而国际货币基金却依然如故，强迫巴西“提高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维持高利率。这种极端的财政和金融紧缩政策，肯定会令巴西陷入剧烈的衰退”。显而易见，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绝不是偶然失误加重危机，而是明知故犯火上浇油。

近年来，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大陆，国际货币基金不顾社会强烈批评的所作所为，不幸更加证实了我以前的分析判断。尽管美国暗中策划的“软战争”谋略属于政府绝对机密，外界无从得知，只有大获全胜后才会由某些知情人，以类似《胜利》一书形式向外界披露，但是从美国国际战略家们公开发表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其思维方式和战略动机。从20多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经济灾难，可以感觉到这些智囊大师的宏谋伟略，绝不是纸上谈兵的夸夸其谈，正化为横扫全球

的“软战争”攻势，显示其威力的证据几乎俯拾皆是。

80年代，美国从战略考虑采取对华怀柔政策，先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前苏联，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给中国人造成了“冷战后天下太平”的错觉。但是，随着美国摧毁了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运用“软战争”重新控制住了第三世界，谋求单极全球霸权的欲望日益膨胀。广为流传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反映出美国已将中国视为重点战略目标，蓄谋铲除威胁其全球称霸的任何障碍。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和我国大使馆，令我深深感到威胁正在逼近国门，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激励我融汇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这本书，无论如何也要警惕美国制定秘密战略，采取“软战争”办法来对付中国，绝不允许美国人再出版一本书，炫耀“瓦解中国秘密战略的胜利”。

我隐约感到美国的隐蔽经济战炮口，正暗中瞄准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要害，威胁着广大人民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凡是误吞西方推荐经济改革药方的国家，尽管它们远隔万里，彼此国情相差很大，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体系坏账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工人失业猛增，造成社会动荡。80年代，中国走自己的改革道路，欣欣向荣，但是，1993年市场转轨热潮后，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广泛流行，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潜伏隐患。这似乎不是一种偶然巧合，值得经济学界重新进行反思。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潜伏隐患，同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很相似，如三角债拖欠数额巨大，企业银行纷纷陷入经营困难，社会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等等。

可惜俄罗斯并未充分重视上述经济病症，反而轻信西方宣扬的规范化经济理论，将其归咎于“改革阵痛”和产权不明晰，误以为加快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就能渡过难关，结果爆发了

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财政枯竭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坏账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大规模挤兑银行。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损失了全部的私人财产。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教训，切不可麻痹大意，因为“软战争”不仅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也直接威胁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包括自己的工资、就业、存款、股票等等。倘若中国不能及时消除重大隐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很可能趁虚而入，不仅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会面临威胁，甚至像南斯拉夫那样惨遭武力干涉肢解。

撰写本书不是为煽动反美的民族情绪，而恰恰是为了维护正常的中美交流，防止像俄罗斯人那样盲目崇拜美国，遭到欺骗之后产生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曾对美国满怀热情，但是由于改革 6 年以来事态的发展，“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美国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贯作风，乃是尊重有实力和智谋的对手，而玩弄容易受骗上当的朋友。中国人天性善良，“不存害人之心”，但是，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须知道，善良的人可以原谅公开的敌人，却难以原谅暗中欺骗的朋友。倘若中国人受到“软战争”伤害，中美关系必遭难以弥补的损失。中国人通过吸取俄罗斯的教训，应该变得更加的成熟起来，避免上当受骗，更好维护自身利益，在扩大国际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更好实现改革开放的大业。

以下扼要介绍本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共有五章，论述中国面临的国内外严峻挑战，美国谋求霸权的全球隐蔽经济战攻势时代呼

唤中国实施富国强兵的大举措。

上篇的第一章从美国悍然用武力干涉南斯拉夫野蛮轰炸我驻南大使馆事件谈起，讲述了美英两国谋求霸权的历史传统。二战以来谋求霸权国际战略的演变，为何从“冷战”转变到“缓和”，战略指出“缓和”并不意味着“韬光养晦”，而是富有隐蔽性的攻其不备谋略。本书认为美国并未赢得“硬冷战”的胜利，但是后来精心策划了“缓和”战略，出其不意发动了“软热战”，却反而攻其不备大获全胜，成功地瓦解了超级大国前苏联，扭转了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变化。本书还从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分析了为何中国没有称霸的野心，为何难以理解西方国际战略的攻击性。

第二章讲述了越战失败导致美国衰落，世界格局一度出现了多极化趋势，东西对峙下蓬勃发展起来了南北斗争。但是美国为谋求重建世界霸权秩序，暗中策划全球隐蔽经济战攻势，酝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向东方和南方发动了猛烈进攻。20年来，美国谋求霸权的全球隐蔽经济战攻势，先是横扫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陆，紧接着摧毁了前苏联这个超级大国，随后又猛烈袭击了曾生机勃勃的亚洲，所到之处无不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令昔日的世界战略格局面目全非。美国“软战争”改变世界实力均衡后，才再次显露出险恶面目——公开追求霸权。

第三章论述了超级大国前苏联衰落的惨重教训，为何前苏联瓦解未发生在体制僵化的时期，而恰恰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改革的年代，美国策划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所起的作用，误导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造成的灾难，深入剖析了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失败之谜，为何股份制改革导致了资产掠夺狂潮。本书认为，美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攻心战略，集中于动摇前苏联领导人的制度信心，这是西方深入研究了前苏联制度的

优缺点，专门攻击其薄弱环节的一种精明厉害战略。前苏联同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新中国成立后与美国发生过多次冲突，美国右翼对中国的仇恨绝不会亚于前苏联，肯定也会制订针对中国的“攻心战”秘密战略，值得引起我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警惕。

第四章深入剖析了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为何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美国趁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机，蓄意推荐了一整套规范改革药方，结果导致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社会灾难。书中深入剖析了其破坏原理和作用机制，如“看不见的手”为何失灵；“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骗局；“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财政、金融、外贸改革的误导。上述各种战略暗器如何相互密切配合，构成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与交叉火力。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宣扬的所谓规范化经济改革药方，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因此，对于亲身品尝西方药方的种种前车之鉴，特别是俄罗斯市场改革的失败教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以免重蹈覆辙。本书告诫中国人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谨防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袭击，消除西方理论影响形成的种种改革误区。

第五章论述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主张应果断采取富国强兵的新宏伟谋略。当前，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包括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的挑战，美国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战略的挑战，台独势力制造海峡紧张局势的挑战，兴修水利抵御频繁洪涝灾害的挑战，防范爆发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挑战。本书认为，时代呼唤着“富国强兵”的宏伟谋略，我们应不辱时代赋予的艰巨使命，将国内外种种严峻形势的重大威胁，再次化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当前，我国应借鉴罗斯福的新政和动员经济，吸取新政因力度不足重新陷入衰退的教训，借鉴动员经济迅速摆脱萧条的成功经验，果断

地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启动力度，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局部动员的状态，迅速消除通货紧缩巩固社会稳定，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威胁，多年来难以治愈的种种社会顽症，不难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疗效。

本书下篇共有七章，论述了改革如何肩负新的时代重任，如何迎接新世纪的经济安全挑战，识别和防范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及时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风险，实现改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剖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种种误区探讨了国有企业如何摆脱困难重振雄风。

第六章为展望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前景回顾了千年、百年以来的沧桑变迁。该章回顾了千年以来中华文明的坎坷经历，如何从繁荣辉煌走到生死存亡关头，又再从逆境中进行顽强不屈的艰苦奋斗，迎来了近代史上最繁荣、强盛的时刻。本书认为，全球化对世界来说并不陌生，19世纪也曾流行过“世界主义潮流”，旧中国也曾有上百年被迫开放门户历史，那段纳入全球化体系的经历颇值回味。本书还分析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那些因素促成了西方社会改良运动，为何会出现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提醒人们西方世界的风向正在逆转，垄断资本为了遏制西方社会改良潮流打击第三世界的“南北斗争”潮流，操纵社会舆论推出了“全球化，潮流 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复古倒退”政策，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正在重现，威胁着人类文明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第七章论述如何迎接新世纪的经济安全挑战，涉及到关系国家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如何识别美国暗器御防化解潜伏风险，实现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探索符合国情的完善政治民主之路，正确处理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加入世贸组织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反对美国霸权，构成了本书中内容最为重要的章节值

得读者耐心阅读、研讨其中的细节。

关于识别和防范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本书分析了其各种暗器容易奏效的原因，如设计巧妙、隐蔽性强，引诱对手落入圈套后再发动猛攻，精心炮制真假难辨的误导理论，等等。本书认为，经济学家不仅应掌握必要的经济知识，还应熟悉西方统治阶层的思维方式，了解真正支配其决策的地缘战略思想，这样才能看穿西方设置的经济理论陷阱，及时根据美国的战略利益动机和行为，准确判断美国谋求霸权的国际战略攻势，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其隐蔽经济战的偷袭。此外，还必须改善我们的经济工作思想方法，提高辩证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力，特别是克服简单、片面的思维方式，因为美国暗器往往利用片面合理性迷惑人。

本书认为，政治改革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容易导致社会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公有制条件下群众能广泛参与民主范围可涉及到一切领域的优势，探索出一种不仅能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能对不同方案进行科学试验，建立社会科学的“可控制实验室”，通过实践不断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有效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种种风险，避免主观主义仓促推行不成熟政策，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影响领导人威信，帮助党内外消除意见分歧并统一认识，促进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源源不断转化为造福社会的美好现实。本书还探讨了实现上述构想的途径。

本书认为，当此全世界面临美国霸权挑战之际，中华文明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反霸责任。中华文明曾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树立了各种文明和睦相处的典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反抗强权历史，曾经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反对西方列强，成功地击败了野蛮的旧殖民主义统治。现在无论是出于爱好

正义的优秀品质 还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迫切现实需要 中国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再次形成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 共同铲除美、英地缘权谋文化的毒瘤 这样才能创造各种文明和谐发展的环境 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第八至十二章 详细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指出改革成败关乎国家命运 深入剖析了改革中潜伏的种种风险 西方产权理论影响形成的种种误区，如何避免出现掠夺资产的腐败风潮 阐述了现代企业的动态成长过程中 产权结构与组织形态的演化规律 总结了企业改革中积累的丰富成功经验 探讨了国有企业应如何发挥独特优势“扬长避短”寻找出摆脱困难的途径 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 如何才能摆脱沉重债务负担轻装上阵，如何解决职工下岗困难维护社会稳定 等等。

第八章剖析了私有制企业的内在利弊，重温了中国私营企业昔日繁荣历史，一个世纪多以来所经历的不幸遭遇 进而论述了公有制企业诞生的原因，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挽救中华民族命运树立的丰功伟绩。该章还回顾了旧中国的股份制发展过程 为何未能成功建立起现代的大工业 公有制企业为何仅用短短数十年时间，成功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还再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义，为何说公有制企业正是民族振兴希望。

该章认为 倘若国有企业陷入了崩溃 意味着数万亿银行贷款和百姓存款的损失，意味着丧失维系国家实力的工业命脉 意味着民营企业将丧失生存市场和发展机遇 意味着竭力赞扬私有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 将失去曾为之提供工资、教育的衣食父母。当前 在通货紧缩和市场疲软的形势下 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利益出发“力挽狂澜” 发挥分布在国民经济关键性产业的优势 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疲软的困境 才能为

民营企业提供不可替代的广阔市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属民族企业 两者的生存与发展是戚戚相关的。

第九章从一则伊索寓言的启示谈起，阐述了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何不能简单模仿西方企业制度模式。改革以来 我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纷纷访问西方 考察了西方国家企业制度发展的现状 详细介绍了关于股份制、公司制的情况，主张也模仿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模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公司化改造。但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思路存在着局限性 侧重于借鉴西方企业制度演化的静态结果 而忽略了其复杂的、漫长的动态演化过程。

人们很容易落入认识论的误区，容易观察到现存的某种静止状态 而往往忽略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 就像鱼儿忽略了鸟儿的漫长进化过程 误以为只要勇敢地跳跃岸上就能飞翔 西方的私有企业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从简单的私人业主型企业 逐渐产生了合伙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 最终演化为股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为了弥补上述缺陷，该章考察了西方企业的动态成长过程中，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 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 以便更好在改革中借鉴股份制的合理内涵，避免俄罗斯推行激进产权改革遭到的失败。

第十章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所在，究竟应选择责任制创新还是产权制度创新。中国和俄罗斯企业改革的一个显著区别 就是中国的企业改革是从责任制创新起步 而俄罗斯企业改革则依据科斯产权定律，从一开始就以深层次的产权改革为主。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批评中国改革不规范，没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产权不明晰问题 但是 转眼间时光如梭，俄罗斯改革已有 10 个年头，两种改革思路的究竟孰优孰劣？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先生，对此有一番颇为精彩的深

刻论述。

该章从斯蒂格利茨谈产权与代理制开始，总结了中国企业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论述了为何中国的“不规范改革”成效显著，而俄罗斯的规范产权改革却遭到惨痛失败。中国的企业改革从经营责任制创新入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扩大经营自主权，改善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加强国有企业的自我积累和技术改造，同时在保留原有责任制框架的基础上创新，有充分的监督约束防止代理人滥用职权，避免急剧的产权变革引起经营秩序混乱，不仅不排斥还能加速正确的产权改革，即随着企业经营能力提高和效益改善，创造出更多的吸收法人和社会投资的条件，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巩固和发展公有制适应社会大生产的优越性。本书还以生物进化规律为生动的例子，形象揭示了现代企业制度演化的客观规律。

第十一章论述国有企业应该如何搞产权改革，指出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的产权改革思路，一种产权改革思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能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一种产权改革思路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将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导致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甚至形成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家族统治，重温解放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噩梦。本书结合我国改革实践积累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了各种形式的产权改革，如股份制、公司制、股份合作制，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破产重整制度，各种形式的企业产权重组，等等。本书认为，产权改革既然属于深层次的改革，就意味着有更大的难度和风险性，必须谨慎地采取符合客观规律的办法，才能避免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的覆辙。

第十二章再析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问题，如产权